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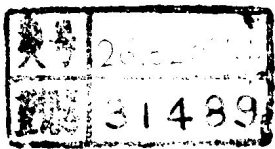
国家文物局主编

#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陶瓷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K971.44  
J111.1

国家文物局主编

#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 陶瓷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联合出版



##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

国家文物局主编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芬尼街2号D侨英大厦

制版：昌明制作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30号新都城大厦

C座536室

印刷：利丰雅高制作(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头内环路南光路口 邮政编码518051

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开本：1180×1060 1/16

印张：31.5 插页：4

版次：1995年8月第1版

印次：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书号：ISBN7-5326-0375-X/J·11

定价：452元

(发行于中国大陆)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陶瓷卷





#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主 编 单 位：国家文物局

主 编：彭 卿 云

副 主 编：刘 炜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承源	王芝芬	王志敏
王克荣	王勤台	王翰章
尤翰青	甲 央	叶佩兰
史树青	白云哲	吕济民
朱世力	庄 敏	刘 谷
刘 炜	刘九庵	孙传贤
苏 俊	杨子荣	杨仁恺
杨关林	李复华	吴正光
邱宣充	沙比提	沈 竹
宋伯胤	宋良璧	初世宾
张春生	陈仲明	陈全方
陈孟东	罗哲文	周其忠
侯菊坤	姚立信	姚 苑
耿宝昌	殷德明	高 和
郭文奎	梅福根	彭适凡
彭卿云	谢辰生	谭维泗
熊传新		

编 辑：杨关林 王芝芬 谈宗英

陈光裕 王圣良 陈 杰

装 帧 设 计：江宝灵 王鉴丰 陈月娴

郑家亮 江小铎



## 陶瓷卷

分卷主编：耿宝昌

分卷副主编：叶佩兰 白云哲

主要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之	王业友	王建华	王春城
王振镛	王慈民	王翰章	石志廉
卢桂兰	叶佩兰	白云哲	白绍芝
白慧英	朱世力	乔文征	刘兰华
刘秀中	刘伯昆	刘树林	刘家琳
汤惠生	孙传贤	孙维昌	贡昌
李秀珍	李蔚然	吴铭生	何介钧
余家栋	宋良璧	张吟午	张明川
陆明华	陈文平	陈献增	邵长波
周世荣	周丽丽	周其忠	胡悦谦
姚苑真	耿宝昌	徐静修	翁善良
翁善珍	黄云鹏	黄汉杰	黄秀纯
萧梦龙	曹者祉	彭适凡	葛玲玲
曾凡	蒲朝绂	蔡环	熊传新
魏达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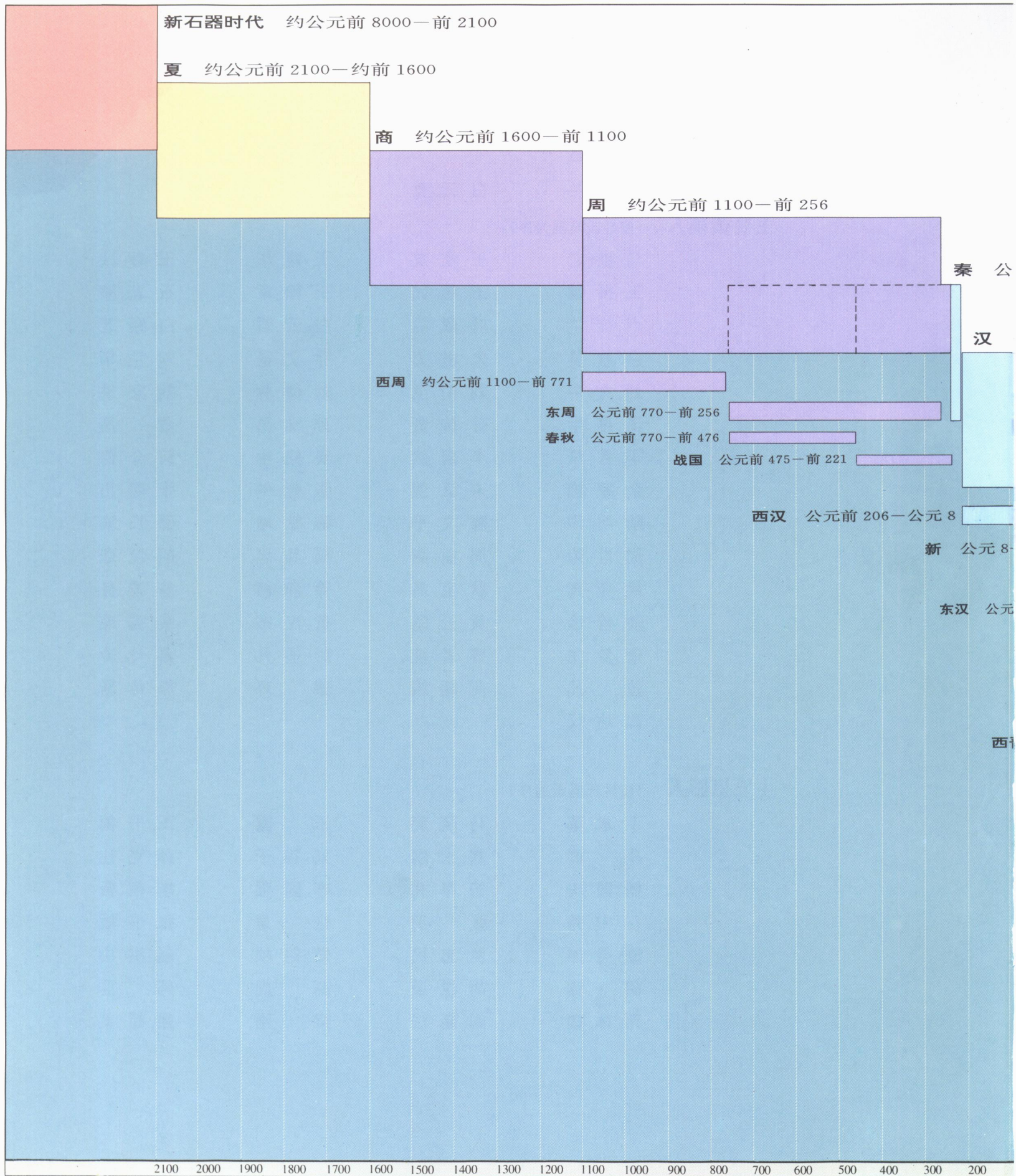
主要摄影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永革	马晓旋	王露	王书德
孔群	刘士刚	刘谷子	孙克让
杨国庆	杨厚礼	李国强	李恒贤
谷中秀	张羽	张慧	张书敏
陈美如	罗忠民	郑铭祯	赵洪山
胡锤	胡悦谦	高虎	郭群
郭林福	阎新法	梁刚	强超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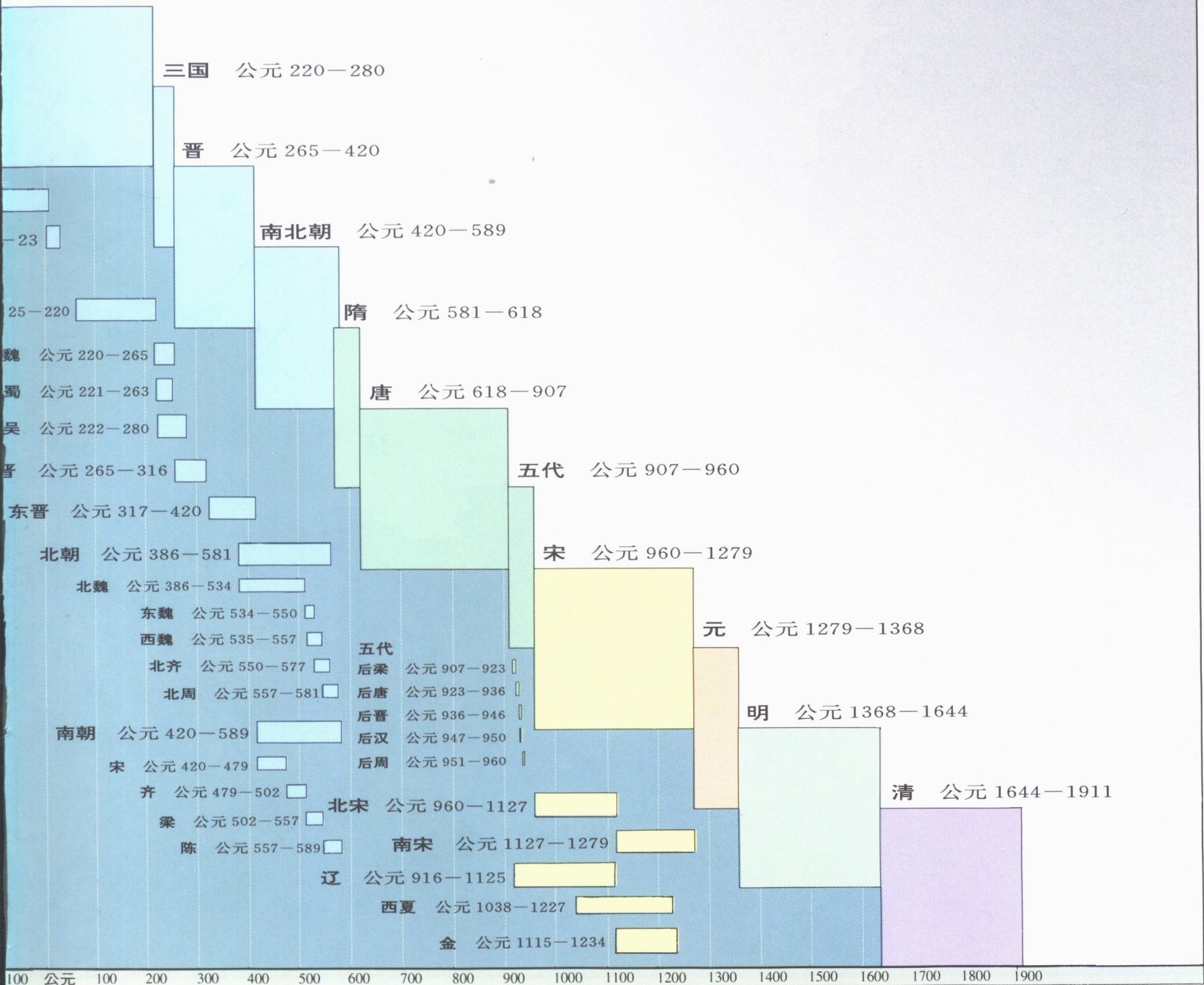
# 中国历史年代表





元前 221—前 206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 中国全图









# 总序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是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具书。它的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冬天。那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同国家文物局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的工作中,发现文物辞书的巨大潜力,又提出了编写馆藏文物辞典的构想。国家文物局出于对历史文化研究和弘扬的需要,同意作为文物系列辞书工程之一,承担编写任务。翌年即行组织、部署,付诸实行。此后,各项编审工作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直至今天,才有幸同读者见面。十年磨一剑,一旦试锋芒,喜悦、欣慰之情,自不待言。

文物辞书的兴起,是文物普及、开放的一项创举,也是图书出版园地的一树新花。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部文物辞典的出现,曾一度风靡海内外,几成纸贵洛城之势。从此,各类文物辞书纷纷面世,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各界的读者,成为传播文物知识,弘扬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更多的读者渴望能有一部更具规模和权威的馆藏文物辞典,发挥多种功能,满足各界的需求。在这种呼声的鼓舞下,《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编撰工作终于开始,大家都对此书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此书编辑工作,除了天时之顺,还享有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保存在地面的文物史迹达数十万处之多,收藏在各地博物馆内的藏品共计千余万件,其中被视为国宝的一级品共十余万件。本书共收录文物五千余件,均选自一级品,近乎百里挑一,其基础之优厚,入选品之精湛,皆可想而知。特别是这五千余件文物,纵贯全部中国历史,横跨整个中国国土,各个朝代、各个省市、各个民族、各个品类,应有尽有。既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又考虑地区、时代、民族的平衡,使之环环相扣,形成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中国文物博大精深,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特点,反映中国文明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史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华古国辉煌历史的缩影。玉出蓝田,得天独厚。多姿多彩的中华文物,为此书提供了赖以立足生根的沃土良田。为此,编者、出版者十载耕耘,坚持不懈,决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内涵,把国内外读者引入古老的中华艺术之宫,让他们享受到永恒的

美。

这样一部堪称鸿篇巨制之作，人和之利乃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国家文物局作为主编单位，为此投入人力之众，财力之多，累计起来十分可观。全国各地参与组织、协调、撰稿、摄影、审议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均数以百计，洋洋乎大哉。在编审过程中，研讨工作之反复，与各地编写人员交往磋商之频繁，更不可胜计。为编写图书如此兴师动众，在文物界确是十分罕见的了。大家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同心同德，共赴艰难，无私奉献。尤其是分别担任陶瓷、青铜、金银玉石、书画四大类分类主编的耿宝昌、马承源、史树青、刘九庵四位著名专家，从年富力强编到两鬓生霜，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坚持承担把关、定稿、作序的任务，其事业心、责任感、治学精神，均可钦可佩。在他们分别所作的分卷序中，全面介绍了各卷的文物情况，并且从文物的产生、衍变，阐释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从人们对文物的探索、认识，概括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文物的形态、特征，揭示了制作者的思维、创造的能力；从对器物艺术性的分析，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此外，白云哲、叶佩兰、刘炜、周其忠、王志敏等专家分别承担各卷的主要编审任务，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文物工具书，是包括许多无名氏在内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是许多专家、学者智慧和专长的结晶。它在各地发掘、收藏、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力求学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确保其权威性。

中国文物的丰富多彩，不单体现在数量之富，更重要的还是品类之全。历代先民生息、劳动所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留下大量可供见证的实物。本书收入的五千余件精品，如按其用途分类，则百科具备，反映了古代人类生活的全貌。出于编辑、实用的需要，全书只能按器物质地共分成四大类（卷）。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艺术鉴赏机会，顺应世界出版业的新潮，全书一律采用实物原拍照片，其中彩图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美中不足的是台湾藏品因至今未能取得适当照片，只好暂付阙如。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了保证质量，不惜心力，采取最新技术出版精装本，向世界各国发行。编辑辞书，虽是雕虫小技，但真正适合众人的好辞书，又谈何容易。特别是文物辞书，非有图文对照不可。对于文物的鉴赏和研究，通常只能按图索骥，才有所获。因此，为了取得所需的合格照片，许多工作人员奔波劳碌，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编辑工作的旷日持久，各地不断出土新的文物精品，又给辞书的收词时限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后经专家讨论，



决定以 1988 年为终限。但是,鉴于此后又有考古新发现,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商代墓的铜器等,曾经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所以仍然未能忍心割爱,收录了其中若干精华之最,从而尽可能使本“大辞典”名实相副。

中国现有的馆藏文物,是中国文物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所蕴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百废俱兴的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如何保护、利用好这笔财富,是当代每个中国人应该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这里必须防止把文物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全盘否定文物的价值,搞民族虚无主义,拒绝古为今用;一是国粹至上,封闭自守,夜郎自大,排斥洋为中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量有益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文化精华,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许多能够发挥科研、教育、借鉴、审美等多种作用的文物,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和展示工作仍是一大薄弱环节。特别是文物图书出版对于文物保护、开放的重要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估计,以致迄今没有一套能够概括中国藏品概貌的大型图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这一状况,与泱泱文物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不相适应,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文物作为人类的文化遗存,既为本民族所共有,又为全人类所共享,其本身就具有开放的性质。任何珍贵的文物,只有通过保护、研究,向全社会开放,让公众领略其价值,才能有机会发挥其作用。如任其永久韞椟而藏,秘不示人,就如同废物,无任何价值、作用可言。文物又作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同现代化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现代化具有特殊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许多国家越是全面开放和发展经济,就越发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开放的成绩,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日本在开放过程中对国外的科技文化大量吸收,其现代化的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又倍加爱护,并且通过陈列、出版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开放展示,其成绩也位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开放和现代化被视为世界之最,它把五十年以上的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建筑等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千方百计地收藏世界各国的文物、艺术品。法、英、德等许多欧洲国家也莫不如此。它们的文物保护、开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予以加强,各自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突出。为什么这些国家如此重视文物的保护、开放,而且能够融传统与现代化于一体呢?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并不神秘,归根结底,是开放与现代化本身的需要。文物通过开放、





展示,不仅满足人们对文物不断增长的爱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赖以增强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维系民族团结,激发国人的献身精神。因此,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文物保护、开放的经验,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特殊关系,对进一步搞好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最大限度地强化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文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在抓住机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能高瞻远瞩,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改革开放的特殊需要出发,果断地确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并且拨出巨额专款落实抢救任务,把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推向新阶段。此时此际,《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得以问世,确是风云际会,值得庆幸。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工作中起到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图书攀登世界高峰之路上迈进新的一步,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补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并没有自负、自夸的意思。但是,确也自信好的文物图书,能够较好地再现文物的内涵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同文物本身一样,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跨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人以永恒的智、德、美的感染和启迪。这样的图书一定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当然,它也同其他图书一样,优劣高下,不能光凭编者分说,而只能由读者评论,实践检验。《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由于规模巨大,内容繁博,差错疏漏必不可免。对此,竭诚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求“大辞典”更为完美。

彭卿云

1992年初秋于北京

# 序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早在远古,中华民族的先辈即已生产陶器,经过漫长历史之长河,商代烧制白陶技艺有了显著提高,并初创出覆以高温釉层的原始青瓷,陶瓷生产从而步入历史的新时期。

陶器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它的发明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继出现陶器,距今已有八千余年的历史,中国最初的陶器还要早些。

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大地湾文化及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距今约七八千年,所制陶器比较原始,常常采用泥条盘筑法或捏塑法成型,器物种类少,器形简单,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多为红陶,少有装饰。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陶器生产逐渐获得发展,除大量的红陶外,灰陶、黑陶、白陶相继出现。较多的陶器表面不仅施有陶衣,更多地彩画植物纹、动物纹及人形纹。在制造陶质用具的同时,还捏塑出不少的人和动物形象,使陶器的实用性和艺术性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大汶口文化在手工成型的基础上,进而发明慢轮成型新工艺,促进了制陶技术的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制陶技术又有了较快的发展。快轮成型得到推广,使器形规整,厚薄均匀,火候较高,胎质坚硬,色泽纯正。灰陶和黑陶成为主要品种,器表彩画减少,而刻划、镂孔装饰较为普遍。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形器,胎体薄如蛋壳,器表压磨漆黑光亮,刻划、镂孔装饰极为精致,代表了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地区的昙石山文化,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都有陶器出土,并具有地方和民族文化特点。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继龙山文化白陶而出现，造型相似于青铜器，以三足盘、觚、盃、爵、角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装饰。

商代陶器，见于殷墟大墓的灰陶大口尊。壶、鬲、簋、罍、杯也为主要造型。饰以绳纹、夔纹、兽面纹等图案。当时由于青铜工艺的发达，从而带动制陶，烧出与青铜器同型而不同质地的洁白细腻白陶。

西周陶器的坛、甗、甬、鬲，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兽面纹、方格纹、回纹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

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

时至战国已礼毁乐崩，以陶代铜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铜工艺影响。陶器品种除灰陶外，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暗花、划花、铺施漆衣彩绘等。最风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先进与落后差别明显，造型的变化丰富。

秦统一六国后，由于工农业的发展，使制陶业也迈入新的阶段。始皇陵兵马俑坑军阵的武士俑、马与将官体形之高大，人物、战马比例之精确，烧选工艺技术之精湛，真可称为一代之奇。具有时代特色的茧形壶与俑饰彩加绘，刻有秦统一天下诏文的陶量等，均为秦代陶器的代表作。

两汉时期陶业极盛，由单调的青灰陶发展成饰粉、布朱与彩绘等品种，陶器的社会功能也更广泛，既有实用品，也制作时兴厚葬的明器。如陕西咸阳杨家湾骑马武士俑群、侍俑及光素施粉轧亮的俑像等。陶塑说唱、乐舞、杂技俑，神态多姿，俱各新奇。时至东汉，发明了黄、绿、褐色低温铅釉。当时烧制大型器物很有水平，多仿塑城堡、院落、亭台、楼阁等建筑物。而仿照日常实用品烧的鼎、炉、尊、盒、灯、桌、井、灶及飞禽、走兽等明器，惟妙惟肖，夸张巧妙。低温绿釉往往因受潮湿而泛有铅的氧化物物质，呈现如金属般光亮的银色斑片，富有特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陶器，仍以骑士俑像等明器为主，北魏的彩绘陶俑发式、甲冑多为少数民族装束。马的身躯矮短，鞍桥几乎及地。北齐褐黄釉龙柄瓶、黄釉乐舞人扁壶，造型特殊，图案新颖，反映了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隋代陶器以白土陶胎敷青白色釉的作品为多，风格鲜明。彩绘陶已很普遍，男女乐俑像及驼、马的造型清秀，隽美雅观。

唐代文化盛极，中外往来、文化交流频仍，制陶工艺发展迅速。伴随制瓷业的兴盛，陶器时有创新，除素陶及彩绘陶外，低温釉陶也增加了诸多品种，由单一着色发展为名溢四海的唐三彩。其色釉以黄、绿、白、蓝、紫为主，相互交错，斑驳灿烂，其中尤以钴蓝彩最为明艳醒目。唐代也重厚葬，明器以文吏、武士、男女乐俑及各种姿势的驼、马、牛、狮、镇墓兽为多，形体均丰腴浑厚。马的肌肉饱满、生动有神。负载重物的沙漠之舟——骆驼，常配以牵驼的胡人俑。贴塑、镶嵌的凤首壶、瓶类，带有西亚文化风采，是时新颖造型倍出，彩绘贴金新工艺绚丽辉煌。

唐三彩陶器生产地，迄今已发现的有河南省的巩县、洛阳，陕西省的铜川，河北省的内丘等。特殊的新疆泥塑陶别有地方风采。

五代时期步唐代制陶工艺之后尘，其风格与唐器十分相近。

辽代契丹族的陶器以三彩取胜，也不乏黄、绿浓淡的单色釉新作品，造型新奇，富于马背民族色彩。最流行的是形状独特的皮囊、鸳鸯、鸡冠、提梁、鱼形、穿带等各式扁壶与海棠、菱形、四方等各式盘，以印刻牡丹花蝶为其主要题材，图案纹饰也民族色彩浓郁。

宋、金、元时期，由于制瓷技术的普遍提高，而使陶器制作亦相应精工细雕，以继前朝工艺的北宋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和二年款的三彩舍利匣、塔最具时代典型。北方诸窑场风行烧制三彩瓶、壶、俑像等。泥塑制作也相当工细，表面施以彩绘，眉清目秀，清新雅丽。元代的彩绘陶俑形象尤其生动，体现了极为鲜明的民族风格。

明、清时期的名陶，以宜兴、石湾窑和元代以来的法华为代表。明代中期，宜兴地区开始用紫砂制作陶壶，文献记载以名匠时大彬所制最负盛名，考古发现时大彬款的紫砂壶，见于扬州明墓出土的六方茶壶，砂质温润，造型浑厚。入清后，康熙时将砂壶饰以珐琅彩绘花卉，书以“康熙御制”款识，是为御用之器。乾隆时发展印刻、戛金、画彩，使之美奂多姿，深受皇帝钟爱。陈鸣远、杨彭年、陈曼生，均为明、清制壶名家。